

人工智能与人文专题

网络末世科幻中的异体宇宙、界限 纠缠与危机生产

——以《小蘑菇》为中心

胡行舟

摘要:《小蘑菇》沿袭了“末世文”的类型化传统,但又广泛调动各种文学资源,以饱含感染力的文字铸成别具一格的末日史诗。它矢志追求修辞的精美和科幻逻辑的自洽,以抒情性的语调发出尖锐的哲学叩问。作者一十四洲尤擅玩味人在穷途末路上赤裸无依的存在体验,人性和保全它的抉择在异体化进程中陷入的悖谬情境,以及人的认知和技术体系被新的宇宙乐章冲溃后的惊惶、错乱、空茫与重认。本文以《小蘑菇》为中心,结合真菌学的知识,推究全面异体化场景下纯洁主义的悖谬及小蘑菇那来自深渊的救赎,尤其从哲学上反思小蘑菇身上所播散出的那种界限稳定的惰性力量,进而由此审视“末世文”这一网络文学类型的惰性想象,并质询其对危机的过度生产。

关键词:《小蘑菇》;异体;界限;惰性;危机

一、末日菌菇：废墟、救世 与后人类启示录

2008年,真菌学家和蘑菇企业家保罗·史塔曼兹(Paul Stamets)在TED^①大会上以《蘑菇拯救世界的六种方法》为题发表演讲,^②引起热烈反响,演讲视频在全球蘑菇爱好者群落中风靡流传,成为不少人的观念助推器或启蒙宝典。史塔曼兹的言传身教也是路易·史瓦兹博格(Louie Schwartzberg)执导的纪录片《神奇的真菌》中的重头戏。这部上映于2019年的影片

将被掩藏的真菌世界搬上舞台,并时常给予其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让真菌向人类申明自身。对真菌的爱好也开始播散于更广阔的流行文

① 指 Technology(技术)、Entertainment(娱乐)、Design(设计与艺术),为美国一家非营利机构, TED 大会即由该机构组织的、旨在“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创意”的环球会议,自2001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详情参见百度词条“TED”, <https://baike.baidu.com/item/TED/8095>。

② 参见 Paul Stamets: *6 Ways Mushrooms Can Save the World*, https://www.ted.com/talks/paul_stamets_6_ways_mushrooms_can_save_the_world, 2018。

化,在2017年开播的美剧《星际迷航:发现号》中,就有一位名叫“史塔曼兹”的天文真菌学家(Astromycologist),他发明了“孢子驱动器”,利用太空菌丝网络实现星舰的瞬时超距传送。这个虚构角色正是在向真实的史塔曼兹致敬。

在此,不妨结合史塔曼兹的演讲、史瓦兹博格的纪录片和其他材料,对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真菌作一点基本的介绍。真菌是高度多样化的异养真核生物,也是大地上生长蔓延的第一类生物,化石证据表明,在十几亿年前甚至更早,真菌就已经出现,先于植物数亿年。20世纪60年代,真菌独立为界,现代DNA研究则进一步证明,真菌与植物的亲缘关系少得可怜,它们是后鞭毛生物类群的一部分,应和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①真菌不能像植物那样进行光合作用,它需要觅食,是高明的寄生者和共生者,而“真菌往往是慷慨的:它在摄入食物的时候也为他人打造世界”^②。真菌利用植物获得糖,但植物也通过菌物获得氮、磷等营养物质,植物根系与菌丝结合成的菌根促进了植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真菌产生酸与酶,能消化岩石、分解腐物,帮助土壤形成,为其他生命搭建舞台,是大自然的再循环器和某种程度的母亲。地下菌丝体还能在树与树间传导营养和信号,编织起一套跨物种互联的“树维网”,增强森林面对威胁时的反应力。^③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大灭绝时,也曾是不需要阳光的菌物庇护了其他与之共伍的生物。史塔曼兹因此在纪录片《神奇的真菌》中总结说,我们这些在六亿五千万年前与真菌分道扬镳的动物,都得算是“真菌的后裔”。而他在演讲中所列举的用真菌拯救世界的方法,则包括用真菌分解石油和其他化学毒素、消灭有害虫蚁、加速造林和生态复育、抗击疾病、生产生物能源等。

的确,真菌并不缺少牵动或改变人类文明的力量——单单一个在1940年达到工业化生产规模的青霉素,就曾挽救“二战”中许多战士的性命,并使得拥有青霉素的同盟国压倒轴心国一筹。然而,史塔曼兹的演讲和史瓦兹博格的纪录片还为真菌的重要性创设了一套特殊的修辞和话语结构:潜在的危机撼动着地球和人类的存身之域,没有巨大的危机和迫近的终结,也

就没有“拯救世界”的缘由;而既然真菌是陆地上的某种初始、母亲、支撑、网络与恒常,那么它或许也是我们面临终结时所应返回的源头,一个无处不在又亘古常新的能量、智慧、原理和共生策略的宝库——仿佛大难临头的孩子可以仓促相认并向其讨要良方的母亲。小行星的故事加深了这种历劫重生的印象,暗示出或会带来生物洗牌亦将人类文明化为灰烬的破坏动能。

简言之,这套叙事所预先肯定的,是一个正在变成废墟因而亟待修复与拯救的地球,是一个废墟化的世界。“人类纪”(Anthropocene)的概念亦隐含其中,即一个晚近的、人类的干扰超出其他力量并主导形塑了全球地理和地球进化的地质纪元。现代资本主义以其对气候、景观和生态系统的巨大影响而从最消极的方向支持了这一概念:人类纪,一个着实把地球弄得一片狼藉的人类时代。正如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所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这条时间线“让‘人类’这一前缀变得更有问题。资本主义的崛起,使人类的想象陷入进步的迷思,加之异化技术的传播,将人类和其他物种皆转化为资源。这种技术将人类隔离开来,并对身份进行监管,遮蔽了协作共存的需要。‘人类纪’的概念既唤起了我们的渴望——人们称之为现代人类的自负,也让我们产生了可以侥幸摆脱这种自负的希望。我们能生活在这个人类的体制中并超越它吗”^④?史塔曼兹引领的真菌爱好者所欲超越的正是人类纪的废墟化进程和异化隔离倾向,他们想象着危机中的协作共存和终结时分的锦囊妙计或精神绽出。通过激发释放出蘑菇身上的后人类符码或“孢子”,他们将真菌的钻研与喜爱转化成一种既建基于现实主义的末世论又力图将之克服的信仰。

对真菌的喜爱与崇仰也旅行到了中国的流行文化场域中。真菌介于动植物之间的混沌特征和奇异多样的生命形态以及其鲜明的“异体

① 参见[英]彼得·罗伯茨、[英]谢利·埃文斯:《蘑菇博物馆》,李玉等译,第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②③④ [美]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第164、166、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性”^①不但引人玩味,而且同样被寄寓了拯救废墟化世界的衷怀。2019年,一十四洲所著的科幻“末世文”《小蘑菇》横空出世,在晋江文学城连载并收获三十多万收藏和百亿积分,口碑人气都居高不下,2020年出版实体书,次年更获得第十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银奖。《小蘑菇》无比激进地将人类抛向了灭绝的边缘,在地磁场消失、辐射肆虐、生物乃至物质全面变异的末日废土上来推想救赎的希望与绝望。多亏了一朵吸取了人类基因而化作人形的小蘑菇,世界才从彻底的人类和人性废墟中找到一种自我异体化的应对之策。真菌的旅行穿过历史终结,还要在荒凉暴虐的末世废土大显神通。在《小蘑菇》这样的网络“末世文”或曰“末世流”小说中,废墟席卷星球,构设着残存的后历史风景,已降临的末日成为小说的幕布和起点:世界全然崩盘,现代已是古代,人类纪被后人类纪甩到遗忘之河,深渊张开血盆大口,尽情吞噬,人们却又必须试着从中抽取救赎与新生的另类潜能。在人类几近“团灭”的边缘,真菌这团“混沌”再次释放出创世性的、开端的力量,带来生机的图腾和逆转的机遇——就算逆转不出另一开端或黎明,也至少让人类在本源渺远的庇荫下化死为生,负重前行。

异体或异质混生的现象在末世文中多如牛毛,异体化逻辑在“Game Over”的压迫和游戏性的轻捷中趋向于极限化,融合一个基因片段就像通过道具获得一个新的技能。末世的人类景观击碎了现代性的整体化冲动,转向了后人类身体形式和后乌托邦组织形式的激进演绎,而这也可看作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表达,以及它在虚构环境中实景化的理论抱负。“末世流”之下,无论对于身体与主体,还是对于文明、历史、哲学、政治和生机,我们都不再能假定统摄诸相的同一和纯洁无垢的源初。相反,我们总需揣思的,是异体化的本体,是播散化的起源,是建基于差异和交染的异-共通体(Hetero-Community)。本文将以《小蘑菇》为中心,推究全面异体化场景下纯洁主义的悖谬及小蘑菇那来自深渊的救赎,尤其从哲学上反思小蘑菇身上所播散出的那种界限稳定的惰性力量,进而由此审视“末世文”这一网络文学类型的惰性

想象,并质询其对危机的过度生产。

二、琴弦拨动:《小蘑菇》中的异体化宇宙

一十四洲将《小蘑菇》的故事起点设定在2154年左右。故事的前史是一系列的灾难和绝境求生:2030年,地磁场消失,太阳辐射异常,气候剧变劣化,全球生物圈紊乱,人类进入“沙漠时代”,开始搬迁至特殊基地过活,并采用人造磁极维系磁场;2045年,全球物种变异,世上涌现出各类混合多态的怪兽,以人类为猎物,人与怪兽的基因亦彼此侵染,“大灾难时代”由此来临。弗吉尼亚基地和东南基地相继沦陷后,地球只剩下北美地下城基地和大约位于亚洲的北方基地仍在组织化运转,北方基地经《玫瑰花宣言》建立起女性集约化生育体系,又通过《审判者法案》创立了无差别枪毙基因污染者——即所谓“异种”——的审判制度,由此换得了人口增长和秩序稳定,开启了“复苏时代”。

北方基地分为精英执掌的主城和平民居住的外城。主城是“人类科技最巅峰时期的结晶”,由三个部门构成:负责调度军备人员和物资的统战中心,即军方;与军方大厦连成一座“双子塔”的科研中心,又名“灯塔”;为基地供应食物和营养并培育幼儿的“繁育、培养与教育中心”,简称“伊甸园”。^②伊甸园中培养、教育出的孩子又根据资质的不同,按ABC三等分到灯塔、军方和外城,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则继续留在伊甸园,待来日接受人工授精,充当基地的繁育机器。通过这些部门的协同运作,基地成为一只“整体的生物”:“不同职责的人是这只生物不同的器官,灯塔是大脑,军方是爪牙,外城的人们是血肉,建筑和城墙是皮肤,伊甸园是子

① “异体”是笔者提出的一个用以描述后人类境况的概念,其最主要的意涵为异质混生的身体和陌生怪异的来客。借助“体”(Body)在中英文里的多义性,此概念亦兼指异质开放的主体、奇异多样的客体、去本体化的本体以及人们所栖居的差异共通体。

② 一十四洲:《小蘑菇·审判日》,第183-184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宫。”^①这只整体生物又被比作蜂巢,其中伊甸园是制造孩子的蜂王,对主城有用的人是雄蜂,被分配到简陋外城、却为主城拼命劳作的平民和佣兵则是工蜂。^②蜂巢自是一个权力中心化的贵族主义和优生学系统,也是每个人的位阶和职能都焊死在格子中的梯级结构,一只头部以“整体利益”为由驱动血肉、冷峻严明的聚合生物。

然而,秩序和安全都是暂时的,北方基地这个“整体的生物”在怪兽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异体化进程的无限扩张下岌岌可危。基地的外围,是怪物游荡的平原和旧人类遗址,而危险等级和污染等级都更高的则是更远处的“深渊”,那里遍布着奇形怪状、杂糅动植物性的变异生物,是怪兽的巢穴和强度中心,也是异体性逻辑放肆播染之地。人类要对抗的,不只是深渊由外而内的侵蚀,不只是怪兽的强化、智能化和群聚化,不只是它们对人类肉身、基因和人造磁极的虎视眈眈,而且是深渊在人类中的展开,是人类自身遭遇“污染”后的怪兽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这宇宙不可抗的异体化趋向。不是人类的语言可以描述,叙述者的这句口头禅或许有几分偷懒,却也反复强调出深渊的拓殖、异体形变的不可思议以及常规、人道与纯洁的难再。而正是非要作此纯洁性的抗争,人类才设立了审判庭和审判制度,也才有了本书的主角之一,审判者陆汎。

审判庭并不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也不效命于三大部门中的某一个,但却有超越其他机关的权力,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发现并清除人类中的异种,无论受到污染的是外城的平民还是军方的高官。审判者陆汎是审判庭的主人,他以不可非议的权威断人生死,他冰冷的绿色眼睛犹如最准确的基因扫描仪,不放过任何混迹于“我族”的他者。他执掌的是近似上帝的权柄,且无论官阶如何,都背负着一个主权者(Sovereign)的形象:如同福柯曾告诉我们的,“君主只有在行使或保留生杀大权时才会实施放生的权力。他只是通过有能力让别人死才显出自己对生的权力……总之,它的象征物是剑”^③。随着异体化进程的加深,陆汎手上的血腥越来越重,为了守护人类的纯洁,将怪物的侵染逐出人界,他和他的属下甚至不得不重启恐怖的审

判日,一次性清除基地百分之六十的人口。^④

但是,审判者再怎样火眼金睛、杀人如麻,也仍然扛不过世界本身的异体化,到后来,“纸张和木头也会相互污染,钢铁和塑料也会……世上一切有形之物都会”^⑤。生物基因的污染只是前兆,异体化的洪流最终把人们带往了一个融解和混生无处不在的蜡制世界。作者搬出了弦理论为这种普遍畸变作出最终解答:其实是宇宙到了换曲子的时候,宇宙的琴弦、那些遍布空间的能量线“要用另一种方式演奏了。又或者,宇宙的频率本来就是混乱的,人类只不过是在短暂的稳定中诞生,当稳定的时代结束,一切又要回到混乱中去……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只有永恒的混乱和恐怖”^⑥。曲式的转折改变产生出异样的波动,它弯折了时空,感染、扰乱了所有的生物和非生物的频率,从根本上颠覆了既往的规律和物质的本性。审判者最终无可审判,他被一个彻底的异体世界架空,也被异体化的后人类时代审判——人类在历经灭亡前的挣扎后走向了放弃纯洁、接受污染、融合他异的后人类之路。而在此之前,审判者已为他所爱之“人”审判:那个“人”就是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安折,一朵长在深渊、却因吸收了人类基因而人形化的小蘑菇,一个比异种更异、却又无法被识别的异种,一个抹花所有界定的“最疯狂的可能”^⑦。也正是靠着这异中之异者的惰性频率的播散,所剩无几的人类才终得以在一顶相对安定的“伞盖”下生存和变异,才踏上了在他异化的自我定义中迎接救赎之黎明的后人类旅途。

无论就对人类的残酷,还是就对物质杂合变异的疯狂催动,《小蘑菇》都达到了一个激进的极点。到最后,北方基地的幸存者不过三百来人,^⑧普世异体化的宇宙“迭奏曲”也势不可挡。然而,《小蘑菇》的激进也是一种类型化的激进,它想象的拓进乃是基于网络末世流小说中既有的传统和风尚。末世文向来以毁灭的世界为基

①⑤⑥⑦⑧ 一十四洲:《小蘑菇·默示录·大结局》,第14、102、210、248、224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④ 一十四洲:《小蘑菇·审判日》,第212、137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第8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始,以废墟为风景,将人类文明遣散为前尘往事,将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隐喻的“荒原”变作小说人物的立足之地。荒原废土之上,一轮一轮的危机将生存逼到死角,过多的残酷也让残酷美学在对残酷的把玩中失去意义,比起赛博朋克犹有过之。在这种设定下,人既是甩脱文明之旧累、绝地重生的新人,又是退回到类似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谓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中的旧人,将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豺狼法则奉为唯一可靠的伦理,连人吃人也都见怪不怪。

如随风飘摇的《蹉跎》中所说:“人们都在为活着而努力,谁还有心思建立什么政府,只有吃的才是最重要的,活着才是最美妙的。文字已经被人们遗忘,文明也早就成为云烟,连历史也不过是面包上的一只苍蝇而已。”^①又如雨水的《末世超级商人》所道:“末世里没有对与错,也没有道德,更没有法律。这里实力至上,只要你比他强,你可以随意地决定他的命运……”^②要在末世求存,势必需抛却那些无谓的界限和标准,所以基因改造、身体强化也好,机甲覆裹、怪物融合也罢,都成为家常便饭,尽管这种“拿来主义”的异体化也总在和纯洁主义的血统论及“整体生物”之优生优育学博弈抗衡。而在末世中挺立下来的强者,也必定是卓尔不群、受到命运眷顾的“小超人”——就此而言,包藏黑暗之心的末世文跟做白日大梦的“逆袭文”其实一体两面,能忍耐极严酷的环境、打破废墟化的魔咒而屹立于末世,本就已是一种奢侈、一种逆袭,本就需要力量的超常积聚和资源的巧妙赢取,只不过这里的“人生赢家”最终所能赢取的,仅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末世文因此也很容易复制“打怪升级”、步步登顶的阶梯套路,嫁接玄幻、武侠、修真等类型元素,而那种逆袭为异体超人的成长模式,也总招引着贵族主义的美学和精英化的组织思维,又从中突破。

蘑菇之救世,同样也有着末世流内部的渊源。随风飘摇曾在《蹉跎》中发明了一句流传甚广的问候语:祝蘑菇丰收,老鼠满仓(或木材翻倍)。在小说中,蘑菇之所以成为祈愿和福音,是因为在战争后无政府的混乱年代里,蘑菇的种植解决了无数人的温饱问题,俨然写下一部救

世神话。改良或变异孢子能在严寒中生长,蘑菇长势又快、晒干后存储又易,再加上其不进行光合作用,无需阳光,只要有木头,就可一年四季有所收获。当然,福音有时也会是死神的乐音,某些变异蘑菇的孢子能寄生在人或动物器官内,最终将整个人体当作生长的养料,就像冬虫夏草菌消耗和穿破蝙蝠蛾幼虫。小说中甚至还有一个蘑菇帮,是专门负责种植蘑菇和收集食品的帮派,帮主“老蘑菇”以杀不死著称,却终于还是死在了巨型狼蚁口下。^③《蹉跎》发表十二年后,蘑菇救世的神话流转到了一十四洲的作品中,并且获得了更富戏剧性和想象力的表达,小蘑菇仿佛要接续老蘑菇的未竟之业,为末世念出不死的咒诀。可这次,蘑菇不再以食用功能来施与救赎,也非以真菌学家史塔曼兹曾设想的那类生态学方案来力挽狂澜。救世的关键,是涟漪般播散的真菌频率,是抵御异体化波动的另一种异体的波动。这一次,蘑菇混入了人界,作为人形化的怪兽而颠倒地镜照着怪兽化的人(即异种),他见证了人类的终结,还要在这崩殂之际无所顾忌地去爱,以异体之身和纯洁人类的卫道士彼此拥入。

三、界限纠缠:《小蘑菇》中的纯洁主义之殇

《小蘑菇》沿袭了末世文的类型化传统,但又广泛调动各种文学资源,以饱含感染力的文字铸成别具一格的末日史诗。诸如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和穆旦的《森林之魅》都被化入小说,渲染着埋骨荒野的惨烈和负隅顽抗的悲壮。《小蘑菇》没有重复“打怪升级”的套路,而是任由篇幅虚涨在漫无边际的飙升之旅中,主要人物或强或弱,始终如一,强者之强也只能用天生贵族来解释;唯一的“逆袭”只在于小蘑菇出乎意料的救世,可这种“逆袭”其实是他为人类做出

①③ 随风飘摇:《蹉跎》,笔趣阁, <https://www.beqegce.com/32997/>,原载起点中文网,2007—2008。

② 雨水:《末世超级商人》,起点中文网, <https://www.qidian.com/book/1551407/>,2010—2011。

的牺牲,未改其柔弱本色。尽管危机和灾难的层叠而至亦迎合着网络连载的消费逻辑,《小蘑菇》却也矢志追求修辞的精美和科幻逻辑的自洽,以抒情性的语调发出尖锐的哲学叩问。一十四洲尤擅玩味人在穷途末路上赤裸无依的存在体验,人性和保全它的抉择在异体化进程中陷入的悖谬情境,以及人的认知和技术体系被新的宇宙乐章冲溃后的惊惶、错乱、空茫与重认。如小说中灯塔的主管纪博士所说:“能得知从古到今人类为生存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成为人类彻底灭亡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其实也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殊荣。”^①读者们于是也都与有荣焉,在虚构叙述的引领下,得以在末日的面前体味如极光般变幻无常的人类命运,证悟“概率就是命运,活着就是偶然”^②,悲叹世界总“使求生者横死,仁慈者杀戮,求真者绝望”^③。

《小蘑菇》最深邃的洞察,正在于界限问题。小说极富思辨地呈现了人在异体化迭奏曲中所面临的界限困窘和纠缠。“人类利益高于一切”^④,这便是北方基地的宪法总纲,可是人类利益究竟在于何方,要维护怎样的一种“人类”利益,其实有很大的争议空间。基地对“人类”的预设则是未被他异性基因侵染、故而边界稳固的纯洁人类,人类利益则是这一自我同一的智慧物种及其文明形态在末日风雨中的持存,以及人类基因在宇宙基因库存中的优越地位。这种对人类的界定完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其底层逻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一旦变成怪兽,就必定服务于怪兽复制自身基因、繁衍自身族群的利益;而从意识上定义人又并不可行,因为受到污染者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保留人类意识,且这种侥幸还毫无规律可循。在宇宙的异体化趋势下,人类不再能捍卫纯洁所需的边界,而守护人类基因、防止怪兽进化出高级智慧的努力也是徒劳——小蘑菇安折的出现就是这种徒劳的明证,而事实上基地外的人类遗址中也一直有不知今夕何夕的幸存者藏身,他们的基因无可避免地向怪物敞开。

棘手的是,捍卫边界、保持纯洁虽属妄想,但轻易地放弃边界、接受交染又很可能会全面沦陷。怪兽有着自己的进化目标和称霸意图,一

旦它们攻占或捣毁了人造磁极,人类物种就再无生存的凭依,几千年文明也会付诸东流。打开边界也并不一定能够换得自由,如同小说中管理伊甸园的陆夫人,她再难忍受基地的暴政和女性的非人处境而化身蜂后,率领变异成蜜蜂的人类幼崽们飞出了“蜂巢”。可自由只在于变与未变之间的生成性时刻,离开了基地之蜂巢,也会有别的蜂巢禁锢住蜂群的意志——“她彻底摆脱人类躯壳的那一瞬间,也就是被蜂后的生物本能所控制……现在是节肢动物的繁殖季,她身为人类的时候在干什么,变成蜂后还是要干什么”^⑤。因此,界限既不能维持,又不可贸然跨越,构成一个难解之局。

更反讽的是,捍卫界限的决绝之举本身也导向界限的内爆,加速了深渊在人性中的蔓延。越是急于确保人性的纯洁,就是对异种和潜在的感染者大开杀戒;越是为了成人,就越是杀人。栖身于血河之上的人又怎能安于自守,得意于他的稳妥边界和纯洁人性呢?如陆夫人所说:

我们抗拒怪物和异种,抗拒外来基因对人类基因的污染,是为了保存作为人类独有的意志,避免被兽性统治……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所作所为,全部违背了人性的准则。而我们所组成的那个集体——它所做的所有事情——获取资源、壮大自身、繁衍后代,也都只能体现兽类的本性。人类实际上没有任何不同于外界怪物的地方,只不过因为大脑的灵活,给自己的种种行为赋予了自欺欺人的意义。人类只是所有普通的动物中的一种,他像其他所有生命一样诞生,也即将像所有生命一样消亡。^⑥

人类对纯洁的执着和对异体性的抗拒反而让

①②③⑥ 一十四洲:《小蘑菇·默示录:大结局》,第128、244、190、14页。

④ 一十四洲:《小蘑菇·审判日》,第50页。

⑤ 一十四洲:《小蘑菇·默示录:大结局》,第32页。女性变形为蜂后并展开复仇的叙述可与徐小斌发表于1996年的短篇小说《蜂后》相对读,参见徐小斌:《蜂后》,第1-2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其在本能的统领下趋近了野兽与怪物,并且还是兽类中最虚伪自欺的一种,而若放下这种偏执,人类或许倒是更坦荡平和的兽,即使灭亡,也更淡然,更能体现高等生物的尊严。基地反对派柯林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基地打着‘一切为人类利益服务’的旗号,却一直在丧失人类的特质。”^①基地在对人类铁面无情的生物性审判中将自身异化为一个利维坦式的陈旧主权机器,一个以杀戮来制造生机的巨型怪兽,一个被强迫症的癡癡所裹挟、界限破裂的“非我”。也可以说基地是安身在一种完全常态化的例外状态中,被标定为异种的人将立刻成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谓的可杀而不必为之承担罪责的“赤裸生命”^②。审判庭一直不敢公开审判细则,因为细则只能判出百分之八十的异种,而留出误杀空间才是第一铁律,^③足可见出这种纯洁化机制内在的狞恶。审判者陆汎天赋异禀,识别异种的能力超常,由他开枪才能最大化地减少误杀率。他也始终和感染以及奇异的波动绝缘,在往往不得善终的审判者职位上勒住了理智的缰绳,而这些却也更显出他身上的某种不同于正常人类的异体性——利维坦的代表不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异种,哪怕他的基因纯洁无瑕。无论基地和审判庭如何宣称一时的冷酷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信念与仁慈,它们都不得不为自己的独断专行和界限执迷付出代价,其结果是将纯洁人类卡死在了抱残守缺的恶性异体机器中,阻碍了其他更具异质性和开放流动性的解决方案。难怪小蘑菇也发现,“人类基地和深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④。

然而,基地也并非未曾朝融合交染的方向探索。事实上,审判庭的前身,竟是灯塔中的“融合派”——一个希望人类和怪物能安全融合、企图拓展人性边界和末世生存地基的科学派别。但是,融合派科学家对异种保持意识清醒的随机概率束手无策。更糟糕的是,一个实验体——一只入水无痕的人形水蛭——利用分身逃出实验室,污染了整个外城水源,从而致使基地全面暴露于感染因子,酿成惨烈至极的灾祸。融合派作为罪魁祸首,为承担责任和收拾残局,不得不摇身一变,连夜成立审判庭,制定审判制度,开始“毫不留情地杀灭所有试图进入基地的融合异

种”^⑤。融合派的负责人波利·琼也正是第一任审判者。但他亦深知审判制度的罪孽和此计的不可长久,于是带领融合派冲破军队的拦截追杀,来到多年前人类研究人造磁极的遗址高地研究所继续实验,并收留尚具人类意识的异种,结成小小的融合主义共通体,自称人类第五基地。高地研究所以秘密频道与灯塔的纪博士通信,虽然不被承认,却仍将基地的人类视为同胞。一十四洲大胆拧合融合派和审判庭,恰使我们窥见科学伦理深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科学有其本体性或自在性伦理,它以追寻真理、试探未知为目标,不断证伪的索解和诸多可能性的摸索势必推动界限的移易拓展;另一方面,科学又有其他律性伦理,要用保守的法条来约束和补偿探求真理、凌越界限的激进倾向。这两种伦理并不总是夫唱妇随,而是屡屡滑脱,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后者为前者捅出的篓子“擦屁股”,科学也就不能不变成彻彻底底的道德和政治。融合派之转向审判庭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极为可怕的进退失据:进无法突破概率,退则屠刀向众。面对世界的异体化转轨,小说中的科学家们频频感叹人类的理论体系已“一脚踩空”,显得比水中捞月还虚幻,但即便如此,身在末世的他们也未抛却现代科学那种挑战界限的衷怀。当然,界限不能被挑动和推移,但狂热或冒进,思之未慎或准备不周,都会时常适得其反。

四、惰性频率:《小蘑菇》中的 界限稳定力量

小蘑菇以界限含混的异体之身尤有殊荣地见证了人类在灭亡之际的界限困窘,进而施予其来自深渊的救赎。安折身上最宝贵的财富,是那种惰性的界限力量。小说不时点染安折带有女性气质的柔弱:他危险等级低,毫无攻击性,安逸不爱动弹,温顺而遵守规则,在陆汎看来娇气得很,生命将尽时更显出“虚无缥缈的

①④ 一十四洲:《小蘑菇·审判日》,第250、74页。

② [意]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③⑤ 一十四洲:《小蘑菇·默示录:大结局》,第177、175页。

空灵”^①。这一柔弱者历险于人类基地,不过是为了寻回他被偷去的一颗孢子,完成将后代养育成熟的使命。按理说蘑菇的孢子常数以亿计,并没有“独生子女”的娇贵,但作者却将安折的孢子设计为唯一性的,明显是要往安折身上注入人类化的母性特征和坚决守护珍视之物的理想性,并且促就一种与“偷心者”重逢的爱情叙事。小蘑菇的娴静与坚定关联着他的“绝对稳态”^②,也就是说,它具有感染和畸变上的惰性,无论摄入了什么样的怪物基因,都能维持初始,即使发生从真菌到人或到其他形态的转变,也都不会丧失主观控制和意识稳定。他同样也没有危害人类的基因污染性,尽管他菌丝中的小毒可致人晕厥。

正是这种界限稳定的力量成为饱受异体化之苦的人类的解药。可这种解药本身也是有“毒”的,它来自深渊,来自异种的频率,它带来的救赎是异体性对异体性——而非纯洁性——的救赎。在蘑菇三个月的自然生命将尽之时,安折甘愿走进高地研究所的高能物理尖端设备辛普森笼,在被高能量场和对撞机轰击成碎片的同时,将他的惰性频率播散到全球——这种播散的频率或许正是无数孢子的化身或替代物。小蘑菇由此拯救了畸变中的万物:“一个故事发生在书上,但这书正在被烈焰焚烧,即将成为灰烬。磁场的频率就像冷气,它对抗那炽烈的热度。他的频率则将纸页变成石棉,使它在烈火中保全自身。”^③安折的频率后来被称作“钟声”,它的播散构成一个透明的“蘑菇圈”,一个笼罩全球、抵御烈焰、逆转丧钟的救赎之环,一个被更新的开端和在播散中生机涌流的本源。作为救世者的小蘑菇既像耶稣又不像耶稣,他没有理由为人类担负,却选择了对他者的至大慈悲。但他的救世又是被预告的,他身上的神性一直和他的异体性与惰性同在。正是出于一种高于也自外于人类的旁观视角与神性立场,他才能将人类的无药可救和永垂不朽审美化,才能从审判庭和融合派中读出道义与仁慈,才能天然地明白“这个世界根本不在意人类的存在”^④“神爱世人,神不爱世人”^⑤,也才能和那位审判席上的神子相爱。

“惰性”常常是个贬义词,安折对于反基

地体制的革命也不抱好感,但是,就连激进理论也应该充分重视小蘑菇的那种惰性的界限力量。一味的界限突进只会让人像变幻不定的霓虹,在异体化世界的色彩翻卷中无所依傍,它或许将人导向某种“混合类”怪兽,将诸种捕获的因子连缀叠加成一团乱麻,却无法使人变得“多态”,即在不同面目之间自由切换又有所保持,有所立足。^⑥小蘑菇的惰性也并不是对界限推移的中止,那种来自深渊、来自异体的救世力量本也在重构着人类物种的定义,它只是让旧人类更温和地“走进良夜”,让新人类的黎明降临。小蘑菇的惰性频率最终把幸存者带往了一个后人类时代,一种在异体化家园或后乌托邦中的栖居。2164年,人类总算融入了这变异厮杀的世界,可人类族群却也“在事实上灭亡了”:“城市解体了。全球幸存者不到五千,他们再也组织不出宏大的社会结构,或是军队这种东西。以东部磁极、西部磁极、高地研究所为中心,小型聚居地呈星形向外辐射……人类在智力上的优越早已终结,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钟声响起,人类活了下来,人类的时代宣告结束,他们好像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物种,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⑦

后人类时代的后乌托邦放弃了中心化、精英化的宏大组织体系,走向了分子态和游牧性的差异共通体模式,人类至上的理念也再无存身之域,人类实际上以“下落”的体态完成了一次谐振于万物和异体化的“上升”。尽管现代科学的尖端成就仍有所保留,但这个时代已经很难用现代性甚或异体现代性来容纳与描述,它只能是现代性在异体性中的爆裂和无限延宕。这样的人似乎也是“返祖”的人,但这其实是否定之上的否定,是在更高层面的返璞归真,如波利·琼所总结:“我们只是带着新的成就与认知,重走一遍当年人类祖先走过的路。”^⑧

至于说变异方面,人类因获得了安折绝对稳定频率的庇护,终于暂停住那不断翻倒的异体化塔罗牌。可对变异波动的免疫只是一个方面,人类也主动地迎向了“污染”:“有时候,因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一十四洲:《小蘑菇·默示录:大结局》,第174、158、248、33、310、63、233-234、234页。

为一个概率,他们甚至能够获取怪物的基因,获得那些强大的体征和形状,而意识仍然清醒。这可能是融合派的胜利——虽然所使用的并不是融合派的理论和方法。”^①正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描述自然人如何在外部环境的偶然作用下冒险进入文明、进入理性的社会法则,^②这里的人则是在外部环境的推动下进行冒险异体化,进入后人类时代的后文明。这到底是融合派愿景的实现,也让人类生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感,但我们也要理解融合派当初卡死在概率问题时那进退失据的尴尬,理解自我异体化总是一种有所承担有所牺牲的冒险,尽管融合派失败后的立即政治化、被迫沉沦为纯洁主义审判-杀戮机器的“变脸”或“改宗”的确值得深省。如今,异体化已成为一种常态,鸟蛋中能孵出人类,浊水能变成纯净水,研究所还“测出了六种确定可以传播的安全频率,其中有一种生物拥有肢体再生能力”^③。曾经的灯塔主管纪博士则开始奉劝陆泓“忘记人类血统论,放下心中的成见,拥抱外来的基因”^④,过去的沉重皆化为轻盈。

小蘑菇的惰性频率并未完全掐灭异体化的烈焰,但它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界限稳定的力量,使人类在逾越界限的同时又能守住基本的安全边界。随着“钟声”的响起,所有有形之物均留驻于当下,“他们能发生多态类变异,但统治意识的永远是钟声响起那一刻的那个主宰者”^⑤。换言之,人和怪物都能在主宰意识的统领下去摄入他异性因素,去自由切换到其他模态,这不是混杂性状的叠加,而是有所约束也不无主心骨的边界拓展。惰性的界限力量就如同为人类设置了一个主界面,一个拥有开放源代码、可升级更新的操作系统,增添不同的软件程序、扩展功能可使之应用万千,但操作逻辑的顺畅可持续、主界面“集成”统帅的稳健却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

在张炜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生长蘑菇的地方》与中篇小说《蘑菇七种》中,^⑥蘑菇曾象喻着革命或与之对立的自由领域,尤其还关涉革命及其遗产在历史变迁中的毒理性。但到了《小蘑菇》中,蘑菇却突出地展露着它柔

顺的惰性,这种不经意的意义转移也勾勒出了一条下滑路线,足见后革命和后政治叙事在21世纪的深入展开。安折的惰性中当然也包含着对情爱、界限、使命的忠诚,但这种忠诚在另一方面又确是对革命的某种排斥和不屑。《小蘑菇》通过柯林这一反对派人物,让反基地独裁和审判暴力的革命声音回荡在叙事空间,但尽管这种声音被释放出来,却没有获得跟基地体制同等的美学肯定性。在安折眼中,柯林和其他革命者们的反抗也许是对的,但也总是不怎么可爱、不怎么迷人的,柯林的喋喋不休也是多少有些令人厌烦而不值得回应的,连他最后葬送于异种的死亡也显得幼稚和讽刺。^⑦在他看来,似乎只有独裁主义的自毁才是傲岸的,只有贵族主义的苛刻才是唯美的,只有对纯洁的誓死捍卫才是壮烈的;似乎存续胜于雄辩也胜于尊严,北方基地只要占据了合法性就足以自证,足以彪炳。

《小蘑菇》通过安折的神性立场对基地体制制作出悲剧化的审美观照,却也以一种美学消极性和情感惰性冷却了革命的声音,那种声音的果敢宣泄和美学压抑构成一种异常平衡的安全态或“绝对稳态”,显出救赎叙事背后耐人寻味的后革命/后政治症候。亦可佐证的是,尽管陆泓上校满手血腥,安折却仍“希望上校一直是那个上校”^⑧,到最后陆泓也拒不接受外来基因的污染——上校还是那个上校,虽然失去了他在权力系统中的位置,却始终是纯洁人类的守灵者。小蘑菇必须和这样的陆泓相爱,他们共享着超越于人类之上的神性、异体性和惰性,他们都在不变中展开了极端严重的背叛,而又在背叛中持守着恒常,亦保有对起源的留恋,他们也都是拯救者和审判者。他们不挑战秩序,但其存在本身就是挑战。确如波利·琼点破,天渊有别的安折和陆泓“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相同的

①③④⑤⑦⑧ 一十四洲:《小蘑菇·默示录:大结局》,第233、273、277、244、204、39页。

② Rousseau,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61-188.

⑥ 参见张炜:《生长蘑菇的地方》,第144-215、266-27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两个人”^①。

五、发明危机：“末世文”的惰性想象

尽管小蘑菇以惰性的真菌频率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我们却还需反思“末世文”这一网络文学类型本身的某些惰性,这些叙述和表现逻辑的惰性使得救赎也依然是一种禁锢。末世文以生死存亡的斗争为基本预设,将危机的发明变成挑动读者胃口、在连载中引起层叠快感的贩售-消费机理。在危机的过度生产上,末世文与(后)现代主义先锋派有相近之处,如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曾指出的:“在现代性这个较大语境中,‘文化危机’的说法特别适用于先锋派。先锋分子远不只是对某种具体的或是一般的颖性感兴趣,他们实际上试图发现或发明危机的新形式、新面貌或新的可能性……如果危机并不存在,它就必须被创造出来。”^②艺术先锋派自是在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下创造文化危机,而末世文则是在后现代境遇下创造全球性灾难和生存危机。在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战争机器愈益精密发达的当下,我们需承认灾难和存亡问题的迫切,但是,连篇累牍的危机想象和或存或亡的绝对性其实遮蔽了通过批判、协商、联合和主动变革来延缓或预防危机的积极路径,遮蔽了更普遍的、在废墟中并非你死我活的共生。存亡让所有暴烈的冲突、蛮横的杀戮和不计成本的豪赌都无可非议,它有时也为危机中的团结和节制创设条件,但这种团结却常是基于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非能动性的消极联合。灭顶之灾下的存亡回避了这一面向:危机是可以在社会运行模式的积极转换中被中和的,也是可以在智性会聚和搀扶共济中被抵御的。危机固有其不可控的概率,但也绝不是一个疯狂生产的发动机。即使危机坐实、灾难降临,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更开放多样、群策群力、灵活融通、流动游击的应对方略,而非仅退回到以死亡权利为最高统御的古典主权模式,或固化于以物种存活为最高目标、不惜血洗他异化“赤裸生命”的现代生命政治模式。

相伴着人类整体的存亡斗争,末世文的另一预设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破碎、弱肉强食。

在这一点上,末世文朝向终结时刻的投影其实也是对当下生活的扭曲折射与安慰。不妨说末世文窥破了末世主义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真相和底部逻辑,温情善好的表象下总藏有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益向着近亲或集团的轮回传递(即利益的“血统论”)。一旦近距离逼视这种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感知到其间的残酷,那么活下来——无论是挺立为漩涡中的逆袭超人,还是蜗居为无所奢求,解除了所谓体制束缚、道德标准和生活愿景的“废宅”——就成了最直接有力的冲动。这种在坍塌的世界中仅以存活和胜败为宗旨的哲学,体现出当代人与文明的疏远,而这种源于异化状态的疏远也使得重塑体制和改变社会现状的政治丧失了动力。在《人的境况》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开宗明义地讲述了“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这一术语本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 *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其原初意义为“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③阿伦特则用这个术语囊括了三种根本的人类活动:一是维系人新陈代谢等自然生命过程的劳动(Labor),二是以世界性(Worldliness)为条件的创造人造物的工作(Work),三则是在复数的人们中间开展事务的行动(Action)。这三种活动都是基础性的,我们既不能以对经济生产过程的关切压倒人的其他活动维度,也不能把与积极生活相对的沉思生活天然地置于生命与行动之上。^④末世文中无止无休的生死拼搏和弱肉强食其实是对人类生活内涵的严重压缩,是人类活动在非世界(Non-World)中的碎裂和放逐,它也正折射出当代人投入“积极生活”的困难。

末世文的危机发明背后还有一种持续振动的界限焦虑,正是这种焦虑加剧了那种对异体化宇宙和人类畸变的奇想。概括说来,界限焦虑源自当代人的技术体验、媒介体验和生存体验。

① 一十四洲:《小蘑菇·默示录:大结局》,第312页。

②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第134-13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③④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二版),王寅丽译,第5、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近年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Neuralink”公司将植入式脑机界面技术带入了公众视野,仅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人类跨越身心疆界、自我异体化的尝试已经引动何等潮流。生物科学广泛的动物实验,动物器官、细胞等在医学上与人类身体的交流互通,也都让“维特鲁威人”的传统边界融解塌陷,引发担忧与探问。媒介体验方面,当代人面临信息世界的进一步敞开和赛博空间的强劲吸入,虚拟化技术致力于让媒介归于某种去媒介化的零度,让沉浸式的体验越来越可能甩脱对媒介物的觉知。现实的地基摇摇欲坠,人和游戏角色、虚拟身体、虚构身份/履历、程序代码的区别不再分明,界限悬垂摇曳,同时散播着自由幻梦和危机信号。就生存体验而言,资本主义的普世商品化,其根底上对人与物的一视同仁,使人类遭受诸般非人化的处置。我们在受到宰制的异化情境中切近了动物、植物、人造物甚至丧尸。弱肉强食法则的放大重申,其实也正来源于当代人对其非人处境的体认,而这一体认亦将人高于豺狼、高于其他生灵的界限建构推向危境。作为调和,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谓的“动物性人道主义”^①,显然也只是在润滑效应中加速这一倾颓。因此,危机在于生存,却也总在于界限,因为正是界限让人类的生存可以定义自身,可以别有追寻。

总之,各类末世危机总令人生畏,但我们更要质询惰性的想象方式本身所隐藏的危机。只有精英主义的组织模式才是具有美感的吗?只有纯洁主义的清洗和抗争才是足够富有悲剧情调的吗?人和怪兽必定是势不两立的吗?人类只能在弱肉强食中自我葬送吗?废墟就只能用

鲜血来染红、来祭奠吗?我们本不必如此想象。当然,小说需要一些极端场景来制造情节的刺激、命运的跌宕,也需要传统套路来保证大众消费的平滑欣快,但人文学却必须在重新想象中开启新的可能,推动人类体制在审慎的界限省察中迈向开放、包容、平等、流动和融通。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危机的应对更趋向于善,而不至于原地打转、陷入北方基地那种越是为了人越是非人的无限悖谬。我们甚至要学会从一开始就以非人、超人或后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评估局势,允诺自由并促进交染,至少在某些时刻引入这些原则,总好过在纯洁主义的偏执中跳进火坑,剩下三百号幸存者面面相觑。灾难有时突临,我们或许来不及去做出理想的反应,但这根能量“弦”必须存在,它在关键时机的振荡或可挽救众生。如此,我们才能从深渊汲取“救赎因子”,才能从不得不如此的末世后人类主义走向积极先行、有所规划的批判后人类主义,才能将反乌托邦逆转为异体化的后乌托邦。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后人类主义与中国经验”(FJ2024C2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行舟,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西方现代哲学、后人类主义理论。

① 即将人还原为物种和动物性躯体、再以同情心为调剂的人道主义。参见[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第252-25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